

香港入境内地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研究

石张宇^{1,2},程乾¹

(1.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2.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商学院,浙江 杭州 311508)

摘要:香港是内地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和第六大贸易伙伴,“一带一路”背景下香港入境内地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状态发生显著变化,从客源地视角探究旅游与贸易耦合协调特征对深化旅贸互动规律认识、促进内地—香港旅贸良性互动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基于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机理,借助耦合模型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定量研究2000—2016年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耦合协调度省际极化效应显著,高水平耦合协调省市仅有4个;从三大地带看,耦合协调度沿“东中西”梯度递减,高耦合协调省(市、区)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从南北方看,地处东部沿海的南方省(市、区)耦合协调优势明显,耦合协调度呈显著正空间自相关,以“高一高”、“低—低”空间聚集特征为主。最后针对两者如何协调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入境旅游;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香港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04(2020)04-0125-08

0 引言

香港入境旅游市场是我国内地外汇创收、旅游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之一,对我国入境旅游产业稳定发展、提质增效具有重要战略意义。贸易频繁化与旅游常态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相互促进、共同繁荣的互动关系已被广泛认可。近20年来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呈现基本同步的增长态势,入境旅游由1997年的500.6万人次增至2019年的8050万人次^[1],年均增长13.5%,货物贸易由1997年的507.7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5886.9亿美元^[2],年均增长12.4%。

然而,香港作为内地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入境游客人次在2008年后开始小幅波动下降,自2010年创下阶段性高点后一直缓慢下降,最高降幅为4.1%,之后虽有小幅回升,但2017年又下降了1.6%。已有研究验证了香港与内地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间存在明显的因果互动关系,随着内地—香港进出口贸易的增长,香港入境内地和内地入境香港客流量能获得同步快速增长^[3]。通过加强香港—内地间的进出口贸易可有效带动香港赴内地入境旅游^[4]。尽管旅游与贸易被视为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但实际上两者又是相互交错、不可人为割裂的系统,两者在不同阶段内如何互动、内部耦合状态

是否和谐及其耦合时空特征等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5,6],自2000年“国际贸易与国际旅游是否相关”这一问题首次被提出以来^[7],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且证明了两者的存在相关性^[8,9]和显著的推拉关系^[10,11],边际弹性分析也证实了旅游对贸易或贸易对旅游有较强的推动作用^[12]。“旅游引发贸易,贸易促进旅游”^[13]的观点逐渐被大众所接受。随后,又有学者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旅游与贸易进行因果关系验证,发现由于各国或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自身贸易特征存在较大差异以及两者间相互交错的特性,导致不同国家或地区旅游与贸易间存在双向、单向或不存在因果关系^[14-17]。由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在统计学本质上是对平稳时间序列数据的一种预测,不能作为检验真正因果性的判据,因此,即便是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也不能否认旅游与贸易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互动关系本质。通过贸易可增加相互关注,进而推动旅游快速增长^[18]。入境旅游促进国际贸易,国际物流也能带动旅游出入境人流^[19],国际商务会议型旅游者通过商务考察谈判能促进出口贸易的增长^[20]。基于重心模型^[21,22]的研究也发现,旅游与贸易重心的演变具有较强的时间同步性,为两者间存在某种因果互动关系提供了证据。

收稿日期:2019-01-04; 修回日期:2019-03-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出境旅游对国际贸易带动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17BJY160);安徽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入境旅游与国际货物贸易互动关系及其溢出效应”(SK2018A0328)

作者简介:石张宇(1981—),男,博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旅游经济与旅游信息技术。E-mail:shizhangyu2002@163.com

国际贸易包含不同类型的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或是不同构成的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部分学者进一步研究了入境旅游和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互动关系和溢出效应^[23],也探讨了不同动机(观光游览、商务会议等)的入境旅游与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间的因果互动关系^[24],更有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究不同类型旅游动机的入境旅游者与商贸行为间的微观机理与互动路径^[25]。可以看出,学者们运用多种方法、从不同视角对不同空间尺度的案例区进行了研究,推动了贸易与旅游互动关系研究进一步向细化、纵深方向发展。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利用时间序列数据或静态面板数据从目的地角度对某国或地区的旅游与贸易进行宏观层面的外部效应分析,缺乏从具体的客源(货源)国或地区视角进行的空间差异研究以及对两者间的内部耦合互动机理分析。

目前,将耦合理论引入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研究的文献相对较少。高楠等首次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研究了我国内地 31 省(市、区)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间的耦合协调特征^[26],但仅考察了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间耦合的共时演变特征,未考虑两者在空间上的关联性与空间分布特征;赵多平等从入境客源国视角研究了阿拉伯国家入境宁夏旅游与进出口贸易间差异化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动态演化特征^[27],但阿拉伯国家不是我国入境旅游重点客源国,宁夏亦非我国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大省,导致研究结论并不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基于此,本文借助耦合协调理论与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通过构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定量研究香港入境内地旅游与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时空分异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地脉、人脉与文脉紧密关联地区的旅游与贸易发展规律与互动机理,以期为我国香港地区入境内地旅游与货物贸易融合协调发展,从货物贸易角度拓展香港入境客源市场提供相应参考。

1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旅游是贸易的增长极,入境旅游发展为双边贸易增长提供了动力支持。贸易是旅游的发动机,国际贸易程度的加深为入境旅游提供了便利条件。入境旅游是人员、服务、文化、信息等的国际“贸易”,货物贸易是商品、资金、技术、知识等的国际“旅游”,两者间相互促进,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间具有显著的耦合协调互动关系(图 1)。一方面,货物贸易繁荣为入境旅游提供便利条件:1)引发大规模入境旅游流。

商贸往来导致以商务会议为动机的入境游客大量增加,这些商务游客又会带动其亲朋、同事,甚至是邻居、熟人等的探亲访友、观光度假、休闲娱乐等多种动机的旅游活动。2)提高我国对外开放度。货物贸易增长能提升市场活跃度与对外开放度,促进国家或地区间的商贸交往与合作,吸引入境游客的关注与兴趣,进而产生商务考察、贸易洽谈、观光游览等旅游活动。3)提高入境旅游服务水平。商品、资本、技术等的输入(出)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较强的正溢出效应,各地区将更有能力完善公共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提升旅游服务质量与水平。4)营造稳定的外部宏观环境。随着贸易领域扩大、贸易规模提升、经贸合作加强,国家或地区间会在政治、外交、经贸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入境旅游发展创造优越的外部宏观环境。另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为双边货物贸易增长提供动力支持:1)构建良好人际互动氛围。旅游素有“民间外交”之称,有利于增进了解、深化友谊,为国家或地区间商贸互动营造和谐友好的氛围。2)架设沟通与信任的桥梁。入境旅游活动加深了对我国内地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了解,文化间的交流、碰撞与融合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理解与认同,为商贸合作洽谈奠定信任的基础,架设沟通的桥梁。3)降低商贸信息不对称。入境游客将有关商品、景区(点)、潜在商机等信息传递给合作方或目的地居民,促进了双方有价值信息的有效沟通^[28],这种信息传播弥补了跨境商机中的信息缺失,有助于降低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额外成本^[29]。4)发挥示范宣传效应。入境游客的商贸行为和旅游活动会对其相关群体和企业产生良好的宣传效果与示范效应,激发客源地企业更多的商机寻求、商贸投资等行为,促进双边货物贸易发展。



图 1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机理
Fig. 1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inbound tourism and goods trade

2 研究方法 with 指标体系构建

2.1 研究方法

2.1.1 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模型 科学评价香港入

境内地旅游与货物贸易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需分别测算两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由于线性加权法适用于各指标相对独立的综合水平测算^[30],本文参考文献^[31,32],亦采用线性加权法对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进行综合发展水平评价,同时采用比较客观的熵值法^[33]确定指标权重。

2.1.2 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真实、客观地反映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水平,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分析(公式与计算方法详见参考文献^[34]),等级划分参考文献^[35,36],将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分为4级:0~0.300、0.301~0.500、0.501~0.800和0.801~1.000,其中,耦合度依次为低水平耦合、颌颌阶段、磨合阶段和高水平耦合,耦合协调度依次为低度协调、中度协调、高度协调和极度协调。

2.1.3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 通常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检验和局部自相关检验,前者用于探讨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的整体空间分布状态,通常用 Moran's *I* 指数进行测度,后者用于测定某省区与相邻省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的差异程度,具体反映各省区两系统的空间聚集特征,通常用局部 Moran's *I* 指数进行衡量(计算公式与测度方法详见参考文献^[30])。

2.2 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科学性、代表性、客观性与可获得性等原则,参考文献^[26,27],分别构建香港入境内地旅游系统7项指标和进出口货物贸易系统8项指标(表1)。1)香港入境旅游指标中的入境过夜游客人数(X_1)、入境过夜游客人均天数(X_2)、入境过夜游客平均停留(X_3)和入境过夜游客人均天花费(X_4)4项指标反映香港入境内地31省(市、区)旅游发展状况,数据来自EPS数据平台中国旅游数据库(2000—2016年);旅游资源禀赋(X_5 ,各地区A级及以上景区数量)、旅游设施水平(X_6 ,各地区星级酒店数量和旅行社数量之和)、交通密度(X_7 ,各地区民航航线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通车里程和内河航道里程之和与本地区国土面积的比值)3项指标反映31省(市、区)入境旅游发展基础,数据来源于各省级单位的统计年鉴(2001—2017年)以及文化和旅游部网站发布的有关统计公报。2)进出口货物贸易指标中的人均国内总产值(Y_1)、居民消费水平(Y_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Y_3)、商品零售价格指数(Y_4)、外商投资企业数(Y_5)和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Y_6)6项指标反映31省(市、区)货物贸易发展基础,数据来

源于EPS数据平台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2000—2016年);进口货物贸易总额(Y_7)、出口货物贸易总额(Y_8)2项指标反映31省(市、区)与香港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状况,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平台中国地区贸易数据库(2000—2016年)。

表1 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货物贸易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Index system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of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 & export goods trade

系统层	指标层	编号
入境旅游	入境过夜游客人数(人次)	X_1
	入境过夜游客人均天数(天)	X_2
	入境过夜游客平均停留(天)	X_3
	入境过夜游客人均天花费(美元)	X_4
	旅游资源禀赋(个)	X_5
	旅游设施水平(个)	X_6
	交通密度(km/万km ²)	X_7
进出口货物贸易	人均国内总产值(元)	Y_1
	居民消费水平(元)	Y_2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亿元)	Y_3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年=100)	Y_4
	外商投资企业数(户)	Y_5
	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亿美元)	Y_6
	进口货物贸易总额(美元)	Y_7
	出口货物贸易总额(美元)	Y_8

3 结果与分析

3.1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2000—2016年31省(市、区)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图2)呈现基本同步的共时演变特征,货物贸易综合水平高的区域,入境旅游综合水平也较高,但共同时序下各省(市、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

入境旅游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为0.14,标准差为0.118,高于均值的有9个省(市),分别为广东、天津、上海、北京、福建、江苏、浙江、辽宁和山东。广东入境游客消费水平不高,但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入境游客人次和人均天数均排全国第1位,因而入境旅游综合水平最高(0.681);天津入境旅游综合水平(0.284)位居第二,入境游客总量不多,但游客停留天数超过20天,为其他区域10倍有余,有效提升了天津入境旅游综合水平;上海入境旅游综合水平较高(0.235)的主要原因在于入境游客消费水平为全国最高;排名后2位的分别是青海和甘肃。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均值为0.18,标准差为0.151,省际差异明显,高于均值的8个省(市)分别为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山东、北京、福建和天津。粤、苏、浙、沪经济发达,具有沿海港口优势,对外开放度高,四省(市)占我国货物贸易总额的比重达63.9%,一直是我国货物贸易大省与强省;排名后3位的分别是重庆、贵州和西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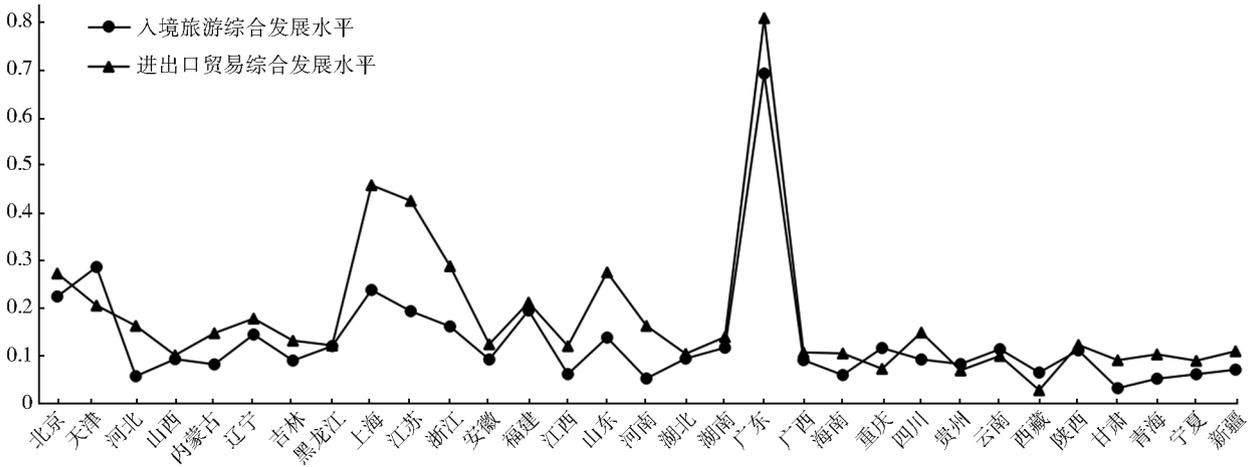


图 2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均值比较
Fig. 2 Comparison of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s of inbound tourism and goods trade

从两系统发展差距看,除天津、重庆和西藏外,其余省(市、区)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均高于入境旅游。广东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均为全国最高,两者间差距不大;苏、浙、沪、鲁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平均比入境旅游高约 2 倍,说明货物贸易繁荣程度与区域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呈正相关。而位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重庆、陕西、西藏等,依靠高品质的旅游资源、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依然对香港游客具有较强的吸引力。

3.2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

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度介于 0.562~0.997 之间(表 2),除河南、河北和甘肃处于磨合阶段外,其余省(市、区)均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说明绝大部分省(市、区)两系统在各自快速发展过程中互动关系显著,耦合状态良好。但耦合度处于高水平阶段,并不一定说明两者耦合协调度高,如西藏入境旅游、货物贸易发展水平分别为 0.064、0.027,两者耦合度高达 0.846,但耦合协调度仅为 0.194。因此,需要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进一步分析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关系。

表 2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
Table 2 Coupling degree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inbound tourism and goods trade

省(市、区)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水平与协调度	省(市、区)	耦合度	耦合协调度	耦合水平与协调度
北京	0.980	0.495	高水平中协调	湖南	0.954	0.377	高水平中协调
天津	0.973	0.476	高水平中协调	广东	0.997	0.877	高水平极度协调
河北	0.698	0.284	中水平低协调	广西	0.972	0.326	高水平中协调
山西	0.951	0.299	高水平低协调	海南	0.923	0.312	高水平中协调
内蒙古	0.904	0.327	高水平中协调	重庆	0.936	0.292	高水平低协调
辽宁	0.946	0.412	高水平中协调	四川	0.931	0.353	高水平中协调
吉林	0.919	0.330	高水平中协调	贵州	0.943	0.272	高水平低协调
黑龙江	0.977	0.349	高水平中协调	云南	0.980	0.343	高水平中协调
上海	0.906	0.624	高水平高协调	西藏	0.846	0.194	高水平低协调
江苏	0.864	0.549	高水平高协调	陕西	0.950	0.362	高水平中协调
浙江	0.941	0.479	高水平中协调	甘肃	0.562	0.184	中水平低协调
安徽	0.937	0.328	高水平中协调	青海	0.842	0.270	高水平低协调
福建	0.971	0.501	高水平高协调	宁夏	0.914	0.274	高水平低协调
江西	0.894	0.294	高水平低协调	新疆	0.927	0.282	高水平低协调
山东	0.906	0.449	高水平中协调	平均值	0.908	0.372	
河南	0.736	0.272	中水平低协调	标准差	0.075	0.139	
湖北	0.974	0.332	高水平中协调				

31 省(市、区)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介于 0.184~0.877 之间,呈“金字塔”式分布,高度耦合协调省(市、区)过少,大部分仍处于中低水平的耦合协调层次,其中,极度协调省份仅 1 个,占比 3.2%,高度协调省(市)3 个,占比 9.7%,中度协调省(市、区)16 个,占比 51.6%,低度协调省(市、区)11 个,占比 35.5%,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态亟

待改善。从三大地带差异看(表 3),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明显的“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东部涵盖极度协调、高度协调 4 省(市),7 省(市、区)处于中度协调,仅 1 省为低度协调,中部有 6 省(区)为中度协调、3 省为低度协调,西部仅 3 省为中度协调、7 省(市、区)处于低度协调类型。东部地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程度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从南

北方差异看(表4),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差异较为显著,南方明显优于北方。高度、极度协调4省(市)皆属于南方,南、北方各有8省(市、区)为中度协调类型,低度协调类型中南方有4省(市、区),而北方有7省(区)。既属南方又属东部地区的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省(市)耦合协调度较高,区位优势明显,经济基础雄厚,贸易与旅游综合发展水平高,是带动其他省(市、区)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表3 三大地带耦合协调度类型
Table 3 Typ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地带	极度协调	高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东部	广东	上海、江苏、福建	北京、天津、浙江、海南、山东、辽宁、广西	河北
中部			湖南、安徽、湖北、黑龙江、吉林、内蒙古	山西、江西、河南
西部			四川、云南、陕西	重庆、贵州、新疆、青海、甘肃、宁夏、西藏

表4 南、北方耦合协调度类型
Table 4 Typ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the North and South regions

地区	极度协调	高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南方	广东	上海、江苏、福建	安徽、湖北、四川、云南、浙江、湖南、广西、海南	重庆、贵州、西藏、江西
北方			北京、天津、山东、陕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吉林	河南、河北、山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

注:南、北方划分标准为秦岭—淮环线。

3.3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空间关联性

为进一步研究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的空间关联特征,将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作为观测指标,运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对两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状态进行空间相关分析。

3.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利用 Moran's I 指数对 2000—2016 年间 31 个省(市、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均值进行全局自相关分析(图3),发现在 5% 的置信水平下, Z 值全部大于 1.96, 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Moran's I 指数在 0.1887 ~ 0.6217 间波动,说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在全局上呈正空间自相关,即具有明显的空间聚集分布特征。其中,2000—2010 年 Moran's I 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空间聚集程度逐年提高,2010—2016 年 Moran's I 指数先急剧下降至历年低点,随后又缓慢爬升,总体上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小幅波动、略有下降特征。然而,全局空间自相关仅反映了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的整体特征,无法揭示相邻省(市、区)间

的局部空间自相关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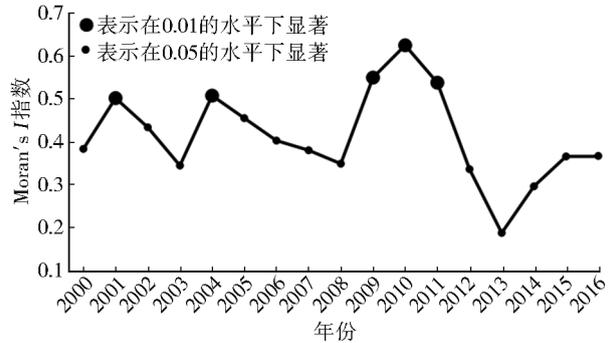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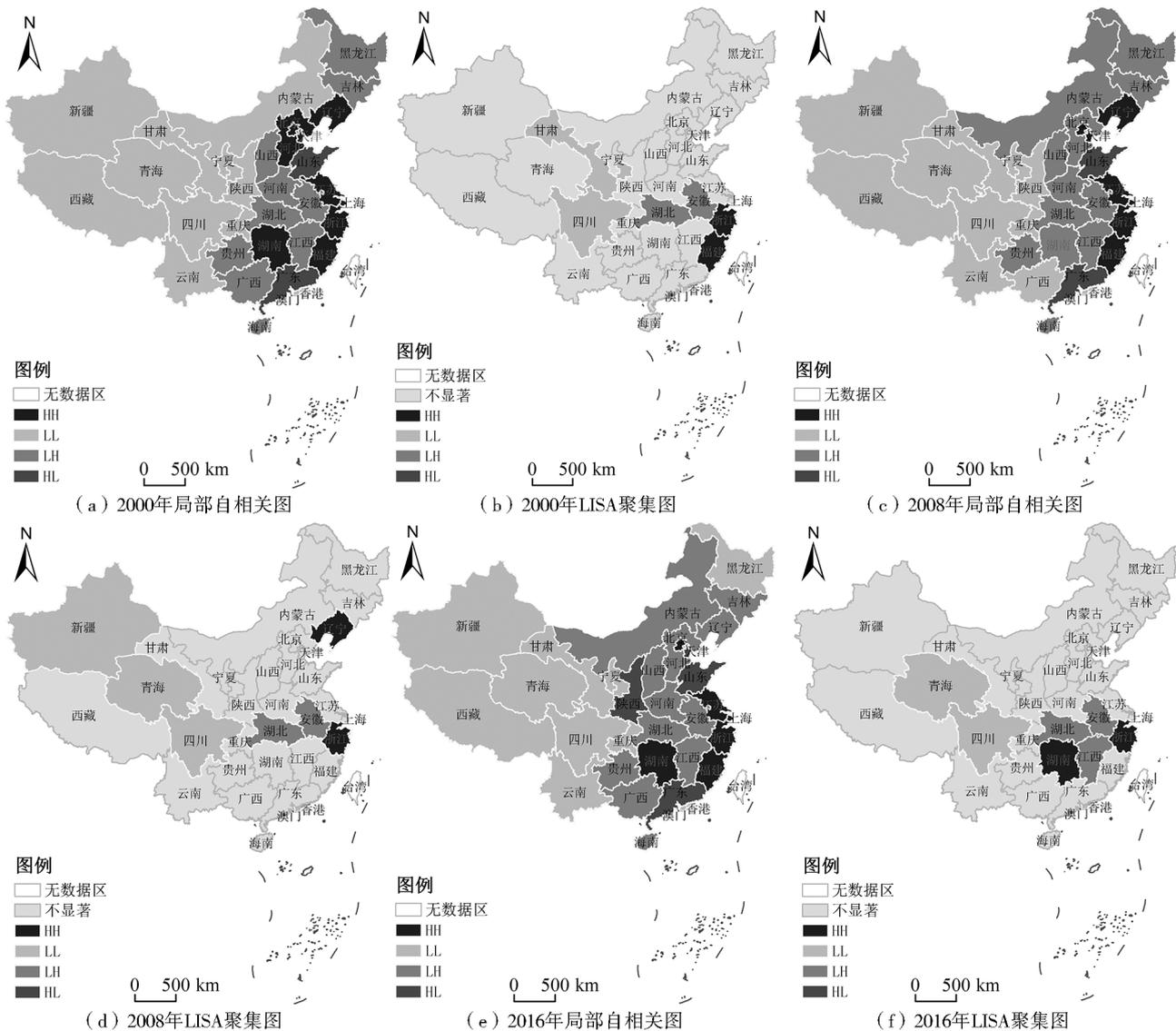


图3 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的全局 Moran's I 指数
Fig.3 Global Moran's I index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bound tourism and goods trade

3.3.2 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 局部 Moran's I 指数检验能弥补全局 Moran's I 检验过于笼统的缺点,真实、具体地反映香港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的局部空间聚集模式(图4),包括“高一高”(HH)、“低—低”(LL)、“高一低”(HL)、“低—高”(LH)4类,并通过 LISA 显著性检验反映其显著程度^[37]。“高一高”(HH)表示相邻的省(市、区)均属耦合协调度高值区;“低—低”(LL)表示相邻的省(市、区)均属耦合协调度低值区;“高一低”(HL)表示某省(市、区)耦合协调度高而其相邻省(市、区)低;“低—高”(LH)表示某省(市、区)耦合协调度低而其相邻省(市、区)高。分别选取 2000 年、2008 年和 2016 年耦合协调度进行局部 Moran's I 指数检验,以反映相邻省(市、区)间的空间关联类型与程度。

(1)“高一高”(HH)关联区域。主要分布在东部并逐年减少,2000 年共有 9 个,2008 年缩减为 7 个,2016 年进一步减至 6 个。湖南是唯一进入 HH 区域的中部省份,相对较高的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发展水平使其能在众多的中部省份中脱颖而出。福建、江苏、浙江、上海等东部沿海省(市)一直稳居 HH 关联区域,区位优势、经济发达,地域上相互毗邻,易形成整体协同效应。LISA 显著性检验显示,浙江、辽宁、湖南是耦合协调发展的代表性聚集区域。

(2)“低—高”(LH)关联区域。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带,数量逐年略有增加,2000 年共有 10 个,2008 年增至 12 个,2016 年无变化。这些省(市、区)耦合协调度偏低,虽毗邻东部沿海耦合协调度高的省(市、区),但受到的正向溢出效应较为有限。安徽、湖北、江西分别通过了 LISA 显著性检验,三省相互接壤,东、南、西部与耦合协调度高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和湖南接壤,受到了显著的正向辐射效应,通过与这些区域的交流合作,耦合协调度将会有更大幅度的提升。



注:审图号为 GS(2016)2889 号。

图 4 耦合协调度局部 Moran's I 指数检验
Fig. 4 Partial Moran's I index test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3)“低—低”(LL)关联区域。数量为 10 个左右,变化不大,但空间格局变动较为频繁,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2016 年地处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变为 LL 区域,又被耦合协调度低的省份所隔离,“孤岛”效应尤为明显。四川、甘肃、青海、西藏等通过了 LISA 显著性检验,甘肃、西藏、青海耦合协调度为全国倒数前三,周边又大多为低耦合协调度省(区),加上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水平相对落后,使其成为“低—低”聚集模式的典型区域。四川的耦合协调度值在中西部属最高,但其被耦合协调度低值区包围,无法享受到高耦合协调度区域的辐射带动效应,长期处于 LL 关联区域中心位置。

(4)“高一低”(HL)关联区域。数量较少,2000 年、2008 年仅有 2 省,2016 年增至 4 个。广东属于高耦合协调度省份,但其对周边区域的带动效应不

明显,周边的广西、江西耦合协调度太低,无法与之形成良性互动。天津排第 5 位,但受北京的“虹吸效应”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天津的香港入境旅游发展水平,导致耦合协调度缓慢降低。山东、陕西分别排第 8、13 位,在全国处于中上水平,但其周边多为低耦合协调度区域。未通过 LISA 显著性检验的 4 省(市、区)多为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区域,但其对周边区域未产生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机理,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 2000—2016 年香港入境内地旅游与货物贸易间的耦合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结论如下:1) 大多数省(市、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综合发展水

平偏低,且入境旅游发展大多滞后于货物贸易。但两系统发展态势较为同步,货物贸易发展水平高的区域,入境旅游发展水平相对也较高。2)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呈“金字塔”式分布特征,省际极化效应显著,高度协调型仅有4省(市)。从三大地带看,耦合协调度呈明显的“东中西”梯度递减特征,高度协调型省(市、区)相对较少,均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带,中、低度协调型省(市、区)偏多,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从南北差异看,高度协调型省(市)皆属于南方,明显优于北方。3)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度在全局上呈显著的空间正相关,主要以“高一高”、“低—低”空间聚集模式为主,两极分化趋势较为严重。“高一高”关联区域缓慢减少,重心由东北向东部沿海渐次转移,并有向中西部扩散趋势;“低—低”关联区域数量变动不大,但空间离散特征逐渐显现;“低—高”关联区域数量占比最大,且逐年略有增加,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高一低”关联区域数量最少,随机分布特征明显。

针对以上结论提出如下对策建议:1)国家应在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政策、资金、税收、项目等方面对中西部予以倾斜。中西部应借助优良的生态环境、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独特的民族民俗风情,针对香港地区游客需求开发高品质、吸引力强的旅游产品与项目,逐步提高入境旅游发展水平;依托政府政策支持,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对外贸易结构,拓展与香港间的进出口货物贸易,不断提高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尽快打破“低—低”空间聚集局面。2)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东部沿海省(市)应充分发挥区域优势,与周边区域在货物贸易发展与入境旅游合作上做到资源互融、产品互通、信息共享、市场共拓,以此带动耦合协调度低值区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的发展,逐渐增加“高一高”空间聚集区域。3)各省(市、区)在制定与香港的货物贸易发展政策时,可以适当融入入境旅游营销宣传,借助商务会议游客、商贸企业与有关商业机构、商品博览会与展销会等宣传内地旅游产品与资源,吸引香港商务型游客赴内地商务考察、洽谈与合作,并通过示范与口碑效应引起其相关群体的兴趣与关注,由此拉动香港入境客流的增长。

限于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在研究尺度上仅考虑到省级层面,未涉及省域内各城市间的差异性;受篇幅所限,未对耦合协调度存在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有待在后续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以更深入地揭示旅游与贸易互动关系规律,推动我国内地—香港

地区间入境旅游与货物贸易耦合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 [1] 文化和旅游部政府门户网站.2019年旅游市场基本情况[EB/OL].https://www.mct.gov.cn/whzx/whyw/202003/t20200310_851786.htm,2020-03-20.
- [2] 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年中国与亚洲主要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深度解读报告[EB/OL].<https://bg.qianzhan.com/report/detail/1907081510007962.html>,2019-07-08.
- [3] 刘祥艳,蒋依依,李玉婷.内地—香港出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货物贸易之间的相互影响——基于VECM模型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16,62(2):117-124.
- [4] 王洁洁,孙根年,黄柳芳.香港—大陆旅游流与贸易流的互动关系分析——基于1990—2009年数据[J].经济问题,2010(12):118-122.
- [5] GRAY E W.The spice trade of the Roman Empire 29 B.C.-A.D.641 by J.L.Miller[J].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70,60(11):222-224.
- [6] KEINTZ R M.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 to and from the United States[J].American Economist,1971(1):6-10.
- [7] KULENDRAN N,WILSON K.Is ther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J].Applied Economics,2000,32(8):1001-1009.
- [8] 章锦河,刘珍珍,陈静,等.中国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J].地理科学,2012,32(10):1161-1167.
- [9] 刘珍珍,章锦河,包曾婷.旅游流与贸易流的相关性分析[J].旅游论坛,2009,2(6):801-806.
- [10] 马丽君,孙根年,王洁洁,等.15年来中日出入境旅游对双边贸易的影响[J].经济地理,2010,30(4):672-677.
- [11] 王洁洁,孙根年,马丽君,等.中韩出入境旅游对进出口贸易推动作用实证分析[J].软科学,2010,24(8):30-36.
- [12] 石张宇,徐虹,沈惊宏.中俄双边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J].人文地理,2015,30(2):147-153.
- [13] 孙根年.大国优势与中国旅游业的高速持续增长[J].旅游学刊,2008,23(4):29-34.
- [14] OZCAN C C.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urism for Mediterranean countries:A panel causality analysis[J].Theoretical & Applied Economics,2016(1):203-212.
- [15] AI-QUDAIR K H A.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ourism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ome Islamic countries[J].Economic Studies,2004,5(10):45-56.
- [16] 王洁洁.入境旅游与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2(11):99-103.
- [17] 石张宇,周葆华,沈惊宏,等.亚洲九国入境中国旅游与进出口贸易互动关系研究[J].资源科学,2015,37(9):1871-1879.
- [18] SHAN J,WILSON K.Causality between trade and tourism: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J].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2001,8(4):279-283.
- [19] SANTANA-GALLEGO M,LEDESMA-RODRÍGUEZ F,PÉREZ-RODRÍGUEZ J V.Tourism and trade in OECD countries:A dynamic heterogeneous panel data analysis[J].Empirical Economics,2011,41(2):533-554.

- [20] BELENKIY M,RIKER D.Face-to-face exports:The role of business travel in trade promotion[J].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2,51(5):632-639.
- [21] SANTANA-GALLEGO M,LEDESMA-RODRÍGUEZ F J,PÉREZ-RODRÍGUEZ J V.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urism flows:An extension of the gravity model[J].Economic Modelling,2015,52(15):267-276.
- [22] 马丽君,郭留留,龙茂兴,等.1994年来中国入境旅游与对外贸易重心演变及其相关分析[J].经济地理,2015,35(11):198-204.
- [23] 苏建军,徐璋勇,赵多平.国际货物贸易与入境旅游的关系及其溢出效应[J].旅游学刊,2013,28(5):43-52.
- [24] 赵多平,孙根年.基于文化关联的旅游与贸易互动路径及机理研究——以宁夏与阿拉伯国家为例[J].地理科学,2017,37(12):1815-1822.
- [25] 刘玉萍,郭郡郡.入境旅游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基于中国2001—2008年月度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4):593-597.
- [26] 高楠,马耀峰,李天顺,等.1993—2010年中国入境旅游与进口贸易耦合关系时空分异研究[J].经济地理,2012,32(11):143-148.
- [27] 赵多平,曹兰州,高楠.阿拉伯国家至宁夏入境旅游和进出口贸易耦合关系[J].经济地理,2017,37(12):226-231.
- [28] ARADHYULA S,TRONSTAD R.Does tourism promote cross-border trade? [J].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3,85(3):569-579.
- [29] BRAU R,PINNA A M.Movements of people for movements of goods? [J].World Economy,2013,36(10):1318-1332.
- [30] 赵传松,任建兰,陈延斌,等.全域旅游背景下中国省域旅游产业与区域发展时空耦合及驱动力[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3):149-159.
- [31] 生延超,钟志平.旅游产业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协调度研究——以湖南省为例[J].旅游学刊,2009,24(8):23-29.
- [32] 刘军胜,马耀峰,吴冰.入境旅游流与区域经济耦合协调度时空差异动态分析:基于全国31个省区1993—2011年面板数据[J].经济管理,2015,37(3):33-43.
- [33] 谭婧,陶小马,陈旭.基于改进熵值法的城市“精明增长”综合测度——以长江三角洲16市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21(2):129-136.
- [34] 王毅,丁正山,余茂军,等.基于耦合模型的现代服务业与城市化协调关系量化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J].地理研究,2015,34(1):97-108.
- [35] 刘耀彬,李仁东,宋学峰.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20(1):106-111.
- [36] 琚胜利,陶卓民,韩彦林.南京乡村旅游景区游客网络关注与景区引力耦合协调度[J].经济地理,2017,37(11):220-228.
- [37] 翁钢民,李凌雁.中国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空间相关分析[J].经济地理,2016,36(1):178-185.

Research on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ainland's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Trade from Hong Kong

SHI Zhang-yu^{1,2}, CHENG Qian¹

(1. School of Tourism and Urban-Rural Planning,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2. H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1508, China)

Abstract: Hong Kong is the first inbound tourist market and the sixth biggest trading partners of Chinese mainland. The coupling state of inbound tourism and goods trade has changed significantl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t is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ourist source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ourism and trade which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active rules and promote the benig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trade between the Chinese mainland and Hong Kong. Based o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of goods trade and inbound tourism, with the help of coupling model and exploratory spatial data analysis method, this paper studied quantitatively th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Chinese mainland's inbound tourism and import and export goods trade from Hong Kong from 2000 to 2016.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has significant inter-provincial polarization effects, and only 4 provinces have high-level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decreases along the "East,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 and the highly coupled provinces and regions are concentrated in the eastern coastal zon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the advantage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of southern provinces in the eastern coast are obviou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how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which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high-high" and "low-low" spatial agglomeration.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oods trade and inbound tourism are put forward.

Key words: inbound tourism; goods trad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spatial-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Hong Kong